

東方

文化集成

季羨林主



伊朗阿富汗
文化編

波斯拉施特
《史集·中国史》研究
与文本翻译

王一丹 著

昆仑出版社



东方文化集成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

王一丹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王一丹 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

(东方文化集成·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ISBN 7-80040-855-8

I. 波… II. 王…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 IV. 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8587 号

《东方文化集成》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波斯拉施特《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

王一丹 著

责任编辑:张良村

责任校对:焦金仓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66531659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phs@public.bta.net.cn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5 千字

印张:10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855-8/I·637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王一丹, 1966 年出生于广东省。1982 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波斯语专业, 1990 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5 年赴伊朗留学, 1998 年底获德黑兰大学波斯文学博士学位, 2004 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伊朗学研究所访学, 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著述有: 波斯文专著《拉施特〈史集·中国史〉校注》(德黑兰, 2000 年)、编著《伊朗民间故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年)、译著《玛斯纳维全集》(第四卷)(合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论文“波斯、和田与中国的麝香”(《北京大学学报》, 1993 年第 2 期)、“拉施特与汉学”(《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3 集, 2003 年)、“《阿湖女士的丈夫》——对多妻制的质疑”(《东方研究》, 2002 - 2003 年)、“伊朗伊利汗时期与蒙古史有关的波斯语文献”(《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 2005 年)、以及波斯文论文“和田的麝香”(Tehran: Āyanda 1993)、“拉施特对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Tehra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n Iranology, 2004)等。

About the Author

Wang Yidan, born in 1966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M. A. for Persian Literatur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90, Ph. D. for Persian Literature from Tehran University in 1998, visiting scholar in the Institute of Iranian Studies at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in 2004, is now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Persian Section,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Cul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ooks:

Wang Yidan (ed.), *Tārīkh-i Chīn az Jāmi' al-Tavārīkh* (History of China and Cathay) (in Persian), Tehran: Iran University Press, 2000.

Wang Yidan (trans. and ed.) Iranian Folktales (in Chinese), Shenyang: Liaoning Children Publishing House, 2001.

Articles:

"Mushk-i Khutan" (in Persian), in *Āyanda* (Tehran, 1993, 4).

"The Exportation of China's Musk to Persia via Khotan", in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1993, 2).

"A Glimpse at Iranian Paintings" (co-authors: M. Bakhtiyār and Zeng Yansheng), *The Fine Arts* (Beijing: 1993, 5).

"Rashīd al-Dīn and Sinology", in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vol. 3), ed. by Ye Yi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Social Trends Reflected in Modern Iranian Literature", in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Research of Oriental Literature* (1): *From Romanticism to Mysticism*, ed. by Wang Bangwei,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3.

"A Comment on *Showhar-i Āhūkhānum*", in *Oriental Studies* (2002—200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Khadamāt-i Khāja Rashīd al-Dīn dar Gustarish-i Chīn-shināsi",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n Iranology* (held on June 17—20, 2002), Tehran: 2004.

"Persian Text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Il-khan Dynasty in Iran", in *The Mongolian Studies in the New Century: Review and Prospect*, Beijing: Minzu Publishing House, 2005.

Translations:

"Persian Myths and Legends", in: Xue Keqiao (ed.): *Oriental Myths and Legends*, vol. 1,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Mowlavī: Masnavī-i Ma'navī, vol. 4 (co-translator: Song Pifang),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史集》是波斯伊利汗国时期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主编的历史巨著,除了人们熟知的“蒙古史”部分以外,还有一个包括印度史、欧洲史、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部分。其中,“中国史”是根据一部现已失传的汉文史书于1304年翻译编写而成的,记述了中国上起盘古、下迄南宋(包括辽、金)共36个王朝的历史和267个帝王的世系,并保存了从汉文史书中描摹下来的历代帝王的画像。拉施特在“中国史”的前言中,介绍了中国学者在波斯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的汉字、历法、印刷术以及官修史书的传统进行了评述,体现了当时西域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史集·中国史》是现存最早的由汉文化圈以外的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不但对了解中国与波斯的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对汉学研究也有珍贵的价值。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关于拉施特及《史集·中国史》的研究,介绍了拉施特的生平与著作、拉施特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成就、《史集》和《史集·中国史》的内容与价值及研究状况、《史集·中国史》抄本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下卷是《史集·中国史》的文本翻译及校注,这是将拉施特的著作第一次直接由波斯语翻译成汉语。汉译本基本根据2000年德黑兰出版的《史集·中国史》波斯文校注本译出,译注者在翻译的同时,还依据目前所见的8个原文抄本对文本作了详尽的考订和注释。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voluminous work of the universal history *Jāmi' al-Tavārīkh* by Rashīd al-Dīn Fazl Allāh, the famous Persian statesman and historian living in the Il-khan dynasty, the volume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contains a selected record of events covering a long history of China, from the earliest ancestor Pangu to the downfall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cluding 36 dynasties and 267 empero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up to Rashīd al-Dīn's time. It is the firs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ritten by a foreign scholar from the Western Regions (Xiyu). Most of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Jāmi' al-Tavārīkh* include many portrait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a*, Rashīd al-Dīn told us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Chinese scholars living in Persia, and gave a description of some featur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de an appropriate evalu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writing, the Chinese calendar system, the technique of Chinese wood block printing, the official tradition of the composition of history in China, etc. His work reflects the exact knowledge and highest achievements of a non-Chinese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ulture studies by that time, and provides us with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Sino-Irani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and confluence in the 13—14 centuries.

The present book consists of two parts: Part One is a study of Rashīd al-Dīn and his book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Jāmi' al-Tavārīkh*, including Rashīd al-Dīn's life and works,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ent and value of *Jāmi' al-Tavārīkh*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Jāmi' al-Tavārīkh*, the manuscrip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collected in different libraries of the world; Part Two is a critical transl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Jāmi' al-Tavārīkh* with highly scholarly notes.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Rashīd al-Dīn's work is translated directly from Persian into Chinese. The translation is based on the first Persian edition published by Iran University Press in Tehran in 2000, providing, whenever necessary, concordances to and comments on the other 8 extant manuscripts.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羨林

名誉总顾问 谢慧如 泰国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名誉顾问

- 纳吉布·迈哈福兹 埃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柳存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杜德桥 英国牛津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 教授
韩素音 英籍著名华人女作家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 教授
谢和耐 法国法兰西学院 院士 法国著名汉学家 教授
马汉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郑子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夏希迪 伊朗德黑兰大学 教授 伊朗德胡达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
谭 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原汉语系主任 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平山郁夫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教授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中村元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比较思想学会名誉会长
梁披云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 福州华侨大学董事长
捷达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金俊烨 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亨根 韩国东国大学佛学研究院院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特别顾问 韩天石 张学书 麻子英

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马 曜(白族) 邓广铭 任继愈 朱维之

汤一介 纳 忠(回族) 启 功(满族) 林志纯 周一良

张广达 张岱年 张岂之 侯仁之 钟敬文

清格尔泰(蒙族) 袁行霈

《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陈嘉厚 叶奕良 张殿英 王邦维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委会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主 编 季羨林 **编 委** 陈嘉厚 孟昭毅

《中华文化编》

主 编 吴同瑞 刘 烜 王守常 **编 委** 王邦维

《日本文化编》

主 编 叶渭渠 **编 委** 潘金生 王家骅 卞崇道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主编 陶炳蔚 编委 金柄珉 金景一 史习成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主编 梁立基 编委 梁英明 梁志明 李谋 裴晓睿

《南亚文化编》

主编 黄宝生 编委 王邦维 王镛 刘曙雄 葛维钧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编 叶奕良 编委 张鸿年 张敏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编 郭应德 赵国忠 编委 杨灏城 孙承熙

《中亚文化编》

主编 赵常庆 编委 余太山 王小甫

《古代东方文化编》

主编 林志纯 编委 拱玉书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张殿英 副主任 卢蔚秋 张玉安 马克承 张光璘

编辑 李 强 姚秉彦 唐孟生 傅增有

昆仑出版社《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魏继光 副主任 董保存 编辑 张良村
施 雷 郭米克

《东方文化集成》书籍设计 朱 虹

丛书编辑出版监制 张良村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 美 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



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惟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 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 页）

姜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



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 99% 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惟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 1471 年和 1474 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惟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 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 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



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话：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



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勒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惟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勒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勒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惟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



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

